



二十世紀初期馬來亞華巫知識分子「興女學」探源：以劉韻仙與再儂為例

王曉嫻¹ 張惠思²

摘 要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析二十世紀初期英屬馬來亞的華人與馬來族群知識分子的女子教育思想。本文研究目的為：（1）探究華人與馬來族群中女子教育思潮的傳播脈絡及潛藏其中的族群意識；（2）以知識女性劉韻仙（1901—1975）及再儂·蘇萊曼（1903—1989）（Zainon binti Sulaiman）為例，分析女性在推動教育所扮演的角色及教育觀。

研究設計／方法／取徑

本研究屬教育史研究，採用文件分析法，使用報刊、雜誌、校刊等史料來再現女子教育發展概況。

研究發現或結論

1. 身處馬來亞的華人族群與馬來族群分別受社會改革思想和宗教改革思想洗禮，將女子教育視為改變族群、提升族群地位、改革社會的途徑而加以推廣。

王曉嫻¹，馬來亞大學中文系碩士生

電子郵件：osy.yuen@gmail.com

張惠思²，馬來亞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

電子郵件：teohhoisee@um.edu.my

投稿日期：2022 年 1 月 26 日；修正日期：2022 年 6 月 17 日；接受日期：2022 年 11 月 18 日

2. 劉韻仙受中國「體育救國」教育理念影響，尤為注重女學生在體育方面的培育；再農·蘇萊曼則因馬來民族身份及伊斯蘭信仰背景，在教育中偏重伊斯蘭宗教教導，以培養賢妻良母為女子教育的宗旨。

研究原創性／價值

1. 馬來亞女子教育的研究數量既少，且基本局限於華人和馬來族群各自的教育發展，本研究將這兩個族群的女子教育置於橫向維度進行考察，系統呈現女子教育發展的共通性。

2. 探析華人和馬來知識女性在教育版圖的擴張過程中扮演的角色，超越傳統以男性知識分子為分析對象的研究取向，深化女子教育研究內涵。

關鍵詞：女子教育、教育思想、知識分子、劉韻仙、再農·蘇萊曼、英屬馬來亞



LIEW YUEN SIEN AND ZAINON SULAIMAN: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EDUCATION IN BRITISH MALAYA'S CHINESE AND MALAY COMMUNITIES

Shiau-Yuen Ong¹

Hooi-See Teoh²

ABSTRACT

Purpose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explore women's educational thought among the Chinese and Malay intellectuals in early 20th century British Malaya. The objectives of this research are: (1) to investigate the dissemination of female education among the Chinese and Malay and its underlying ethnic consciousness; (2) to analyze the role women played and their outlook on education by studying contributions made by Liew Yuen Sien (1901-1975) and Zainon binti Sulaiman (1903-1989).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by utilizing sources including newspapers, periodicals, and school magazine. This subject was subjected to document analysis.

Findings/results

1. Social and religious reforms led the Chinese and Malays in British Malaya to advocate for female education as a means to improve and elevate their societal status and revolutionize their respective communities.

2. In contrast to Zainon, who emphasized on Islamic teachings and

Shiau-Yuen Ong¹, Master postgradu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E-mail: osy.yuen@gmail.com

Hooi-See Teoh², Senior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Malaya

E-mail: teohhooisee@um.edu.my

Manuscript received: January 26, 2022; Modified: June 17, 2022; Accepted: November 18, 2022

sought to nurture devoted wives and mothers due to her Malay Islamic identity, Liew Yuen Sien was influenced by Chinese nationalism ideas and focused on female athletics.

Originality/value

1. Studies on women's education in Malaya are scarce, and they were limited to separate studies on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and Malay communities. This study puts the women's education of these two communities in a horizontal dimension, and systematically presents the similari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education.

2. To analyse the role of Chinese and Malay intellectual wome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respective ethnicities' educational landscape. This research goes beyond the traditional analysis of male intellectuals and deepen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tudy of women's education.

Keywords: female education, intellectuals, educational thought, Liew Yuen Sien, Zainon binti Sulaiman, British Malaya

壹、前言

歷史上英屬馬來亞（簡稱馬來亞）是二次大戰前大英帝國在東南亞的主要殖民地，涵蓋馬來半島的海峽殖民地、馬來聯邦和馬來屬邦¹。十五世紀，伊斯蘭文明已在馬來亞傳播並形成蘇丹王朝。當中最突出的便屬馬六甲王朝（1402—1511），而馬來族群傾向於將自身的民族源頭與馬六甲王朝的開創者聯繫起來²。如今學界普遍認同馬來半島的馬來人是源自印尼蘇門答臘的說法，因於該地有一條河流名為「馬來河」，源自該地的人會以馬來人自稱（Swettenham, 1907, pp. 144-145）。由於晚清著作把馬來人譯為「無來由」（陳倫炯，1984，頁 54）或「巫來由」³，因此「馬來人」也稱「巫族」。根據馬來亞首個官方的定義，「馬來人」是指稱說馬來語（或其他馬來亞語言）和信奉伊斯蘭教的族群（Andaya & Andaya, 2001, p. 183）。因此，伊斯蘭教是形塑馬來社會和文化的重要資源。

至於馬來亞華人社群的形成，也同樣可追溯至馬六甲王朝時期。1403 年，當明朝太監尹慶出使馬六甲時，當地還是個漁村，而領導者拜裡米蘇刺（Parameswara）是酋長，後者向中國進貢以尋求庇護（陳鴻瑜，2010，頁 154）。1405 年，拜裡米蘇刺受中國冊封為馬六甲國王（林遠輝、張應龍，1998，頁 250），馬六甲也正式成為明朝的藩屬。由此，馬六甲由一個小漁村發展為重要的貿易港口，吸引了中國商人在此進行貿易，這些非土生土長的外來華人被稱作「新客」（楊貴誼，1997，頁 39）。隨著華族人口的增加，馬六甲國王將華人社區的領袖委任為四人之一的港務官員，協助管理華人的商業活動（顏清滄，2005，頁 159）。在此背景下，華人

¹ 海峽殖民地涵蓋現今的新加坡、馬來西亞檳城州、馬來西亞馬六甲州；馬來聯邦涵蓋現今馬來西亞的雪蘭莪州、森美蘭州、霹靂州、彭亨州；馬來屬邦則指現今馬來西亞的玻璃市、吉打州、吉蘭丹州、登嘉樓州、柔佛州。

² 根據馬來民族的重要文學著作《馬來紀年》，馬來人的祖先是來自印尼蘇門答臘的王族，到馬六甲開創了王朝（許雲樵，1966）。

³ 根據林遠輝與張應龍（1998）編撰的《中文古籍中的馬來西亞資料彙編》，「巫來由」出現於薛福成《出使奏疏（卷下）》之〈請豁除舊禁招徠華民疏〉（頁 508）、徐建寅《歐遊雜錄》（頁 538）等清代著述。

跟當地民族（尤其是馬來人）通婚產下的混血族群統稱「土生華人⁴」，男性為「峇峇」、女性為「娘惹（宋旺相，1993/1923，頁3；楊貴誼，1997，頁39）。

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初，是華僑人數在馬來亞急劇增長的時代。由於英殖民政府致力開發海峽殖民地的天然資源和經濟領域，吸引了大批中國華人南下尋求貿易和工作機會。為方便論述，本文將這些保存中華文化認同、熱切關注中國政治的華人移民統稱「華僑」；在海峽殖民地受英文教育和西方文化影響、効忠於英殖民政府的土生華人群體則以「海峽華人」稱之⁵。隨著大批華僑往馬來亞遷移，人口結構產生變化，有些地區的華僑人數已超越馬來族群⁶。

這一時期，英殖民政府對方言學校並不重視，對華族、達米爾族群和其他族群的教育不甚關注，只為馬來族群建設馬來學校，且專門為培養馬來官員而建設英文學校（Elcum, 1908, p. 267）。在此背景下，華族教育卻在數十年間歷經傳統私塾到新式學校的教育場景置換，教育對象亦由男性擴充到男女皆有機會追求新知。幾乎在同一時期，馬來族群中的知識分子注意到華僑的熱烈辦學氛圍，而鼓吹女子教育的風氣也逐漸在馬來族群中蕩漾開來。這不由得令人思考兩個族群之間在女學辦學上的情況會是如何。

關於二十世紀前半葉馬來亞的女子教育，目前的研究成果與關心大抵集中在華族和馬來族群的各自教育發展脈絡，未將兩個族群的教育發展進行橫向考察，無法揭示時代中同一片地區不同民族之間女子教育的異同。馬來亞女子教育的研究數量既少，同時甚少關注知識女性在當中扮演

⁴ 保留純華入血統、在馬來亞土生土長的華入族群也稱「土生華人」，只是馬來文名稱略有不同（楊貴誼，1997，頁39）。

⁵ 「海峽華人」是歷史名詞，用於指稱在「海峽殖民地」享有與英國公民同等的身份和權利（Forst, 2005, p. 40）、受英文教育和西方文化影響的華人群體。1946年，英國宣佈解散海峽殖民地後，海峽華人成為歷史名詞，英籍海峽華人協會改名為土生華人協會。

⁶ 報刊記載，1928年馬來亞的華入人口則佔三分之一以上。根據1921年的海峽殖民地人口調查，該地共有883,353人，其中華入佔498,547人，馬來人佔255,356人，印度人佔140,628人，歐人佔8,149人（〈英屬馬來華僑的優越地位〉，1928，1版）。

的角色。本文聚焦二十世紀初期的馬來亞場域，考察產生於華僑與馬來族群內部的教育思想及理念，如何形塑出同中有異的女子教育形態。同時，本文亦從兩個族群中選取了同樣活躍於二十世紀初的新馬教育界的劉韻仙（1901-1975）及再農·蘇萊曼（1903-1989）為中心，描繪女子教育發展過程中，華僑和馬來族群的教育推動模式及潛藏其中的族群意識。兩位女教育家的經歷雖存在著個人脈絡的特殊性，卻也揭示著時代中某些共通性。由此，觀察華人與馬來知識女性如何在這個特殊時期擔任女子教育推動過程中的重要角色，有助我們釐清馬來亞女子教育誕生背後的規律，捕捉時代特徵。

貳、社群主動性與女子教育思想的傳播

在現代化女子教育發軔前，英屬馬來亞的馬來女性和海峽華人女性主要在家中接受傳統的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多由親人傳授，著重於道德教育和日常勞動訓練，如：家務、烹飪、女紅（宋旺相，1993/1923，頁 294-295；Manderson, 1980, p. 23）。

在此基礎上，幼年的馬來女性多了一項以研讀可蘭經為主的宗教教育（Manderson, 1980, p. 23）。在達到可婚配的年紀後，馬來女性和海峽華人女性只能待字閨中，養成柔弱和沉靜的特質，等待家長安排婚配對象（宋旺相，1993/1923，頁 294-295；Manderson, 1980, p. 24）。從馬來女性和海峽華人女性成長經歷的相似，可發現在保守社會下生長的女性都受制於禮教，脫離不了賢妻良母的家庭角色。

直至十九世紀，發端於教會的女子學校才為馬來亞帶來簡易的女子教育。早期的教會女校，出於慈善的性質和傳教目的，首先以華僑女性為目標群體。以新加坡第一所英文女校⁷—聖瑪格烈女校（St. Margarets School）為例，創辦人瑪麗戴爾（Mary Dyer）是為了救濟被非法販賣的華

⁷ 根據何曉夏與史靜寰（1996）的研究，新加坡的中國女子教育始於 1825 年，該校由英國女子格蘭托（Miss Grant）於創辦（頁 221），但此說未獲證實。根據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的紀錄，創辦於 1842 年的聖瑪格烈女校是最早招收華僑女性的英文女校（NLB, 2019）。

僑女性「妹仔」而創辦該校，為她們提供英語、家政和宗教教導（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Digital Library [NLB], 2019）。由英殖民政府創辦，但實際由教會管理的新加坡書院則在 1844 年 3 月 4 日創辦了女子教育班（Elcum, 1908, p. 271）。該女子教育班開放給各族孤女（Singapore Institution, 1844），注重道德和宗教教導（Raffles Girls' School, 2006, p. 23）。此後，其他新教及天主教所屬的英女校陸續在馬來亞建立，如檳城地區：1860 年建立的檳城修道院女校、1884 年的聖喬治女校、1892 年的英華女校，及吉隆坡地區於 1899 年創立的聖嬰女修道院學校（Elcum, 1908, pp. 274-280）。

雖然英女校的招生對象涵蓋華僑及馬來女性，但因其具有濃厚基督教色彩，容易引起華僑和馬來家庭的反彈。在 1896 年 7 月 25 日，便有讀者致函新加坡報紙，揭露美以美學校對學生傳教一事，最終導致逾百名學生的轉校潮（宋旺相，1993/1923，頁 242）。面對族群中女子教育情況落後的情況，華僑和馬來族群在應對這一問題時採取的行為及主動性就顯得尤為重要。本節主要從海峽華人、華僑及馬來知識分子群體探究女子教育思想在新馬的傳播過程。

一、海峽華人與華僑的辦女學思想

事實上，發酵於華僑中的興女學呼聲，自 1888 年便於華文報刊中初現端倪。《叻報》（1881 年—1932 年）是新加坡的首份華文報刊，該報由受英文教育的峇峇薛有禮創辦，長達五十餘年的刊行使其保存了大量南洋華人社會的珍貴資料。《叻報》於 1888 年 6 月 25 日出現了鼓吹女學的一篇社論〈女學說〉，為提倡新加坡的「女學」開了先河：

西國女子無不知書，故其女子之才，不亞於男子；有為女醫士者、並有為女狀師、女司舟者，然則其閨才之可盛可知矣。然若使有人創斯盛舉，建立女塾於叻中，延請才女為之師，招良家女子而教之，使其識禮法而別倫常。（〈女學說〉，1888，1 版）

須指出的是，當時華僑社會中的婦女為人所詬病的行為有：不守女德、不守貞潔、貪新棄故、慕富厭貧、嬉遊聚賭（〈女學說〉，1888，1 版）。作者因此提出西方女子普遍受教育及人才輩出的情況，對比新加坡女子教

育的缺失，說明女子接受教育的可能性。由此，作者呼籲有識之士在新加坡開辦女子學校，開創女子教育的前景。此後，該報陸續刊登與女子教育相關的社論〈女子實貴讀書說〉（1890）、〈女子宜於讀書說〉（1890）、〈叻地宜興女教說〉（1894），論述離不開將「女教」與國家的興盛聯繫起來，期望通過女子教育培養賢妻良母，以此強調興辦女子學校的急迫性。

除了《叻報》，《檳城新報》（1895 年—1941 年）也是一份在馬來亞半島流傳甚廣的華文報刊。該報於 1897 年至 1899 年刊出數篇討論中國女教運動的文章（黃賢強，2008，頁 148）。1897 年 8 月 7 日，題為〈振興女學議〉的文章刊於該報頭版，內文批判了中國重男輕女及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舊觀念，通過說明西方男女平等的教育觀致使才女輩出、擔任各職的情況，強調女子教育的益處。接著刊載於該報，有關女學的文章包括〈論女學堂〉（1898）以及〈論女學〉（1899），論述間多將「女教」與國家的存亡相提並論。

在推動女學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代表人物要數傑出的海峽華人林文慶和宋旺相（宋鴻祥）。林文慶是出生于檳城的第二代峇峇，宋旺相則是出生于新加坡的第三代峇峇。林文慶於 1887 年成為新加坡第一位獲得英國女王獎學金的華人，前往愛丁堡大學深造，並於 1892 年學成返回新加坡（宋旺相，1993/1923，頁 197）。在英國留學的六年間，他不但接觸了西方的進步思想、教育普及的情況，也見證西方國家的富強。當他回到新加坡，便立志在海峽華人社會進行道德、社會和教育改革（宋旺相，1993/1923，頁 198）。宋旺相則是繼林文慶之後，第二位獲得女王獎學金的峇峇。他於 1889 年赴英國學習法律，進入劍橋大學唐寧學院，於 1893 年學成返回新加坡當律師（宋旺相，1993/1923，頁 204-206）。林文慶於 1895 年成為新加坡的立法議會委員，是極少數能進入政治體系的土生華人。這兩位峇峇領袖於 1897 年 1 月一同創設「中國好學會」（Chinese Philomatic Society），又於同年 3 月合作編輯《海峽華人雜誌》（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Magazine，1897，頁 3），藉此宣揚東西方文化以改革海峽華人社會（張亞群，2012，頁 37）。

以改革海峽華人社會為志業的《海峽華人雜誌》（1897 年—1907 年），除刊載許多批評土生華人陋習的文章，亦特別關注女子教育問題。宋旺相於《海峽華人雜誌》創刊號發表了有關海峽華人婦女的文章《華人婦女的

地位》，主張通過學校教育來改進婦女地位，使民族進步（Song, 1897, pp. 16-23）。他建議學校從德育、智育、體育、群育方面培養出健全的女學生。智育方面，學校應授予華文、英文、數學、縫紉刺繡、家務管理、衛生護理、音樂和繪畫等課程；德育方面，若是教會學校，應注重聖經教導，其他學校則注重灌輸一般道德準則或儒家倫理；體育方面，應通過體操鍛煉學生的身體；群育方面，則為女性提供社交機會（Song, 1897, pp. 16-23）。林文慶則在《我們的敵人》一文中指出海峽華人在教育、社交生活，以及信仰方面的不足是導致海峽華人社會退步的主因。他指出，女性扮演了教育下一代、促使族群進步的重要角色，社會必須注重女性在智力和體力方面的成長（Lim, 1897, pp. 52-58），方能進步。他們將女子教育重要性由家庭層面的「賢妻良母」上升至社會的「族群進步」，教育的內容也加入西方的分科方式，體現了女子教育思想的轉向。

在峇峇領袖之外，華人移民社群的領袖也對女子教育問題予以關注。邱菽園是新加坡第二代中國移民，其父邱正忠是新加坡著名米商及福建社群的領袖（宋旺相，1993/1923，頁 84）。出生於福建、接受舊式教育的邱菽園於 1894 年的中國科舉考中舉人，後因會試落第無心仕途，返回新加坡從商、從文，成為新加坡華僑社會的領袖之一。有過在中國考取功名經歷的邱菽園自然對中國時局極為關注，而他更受梁啟超在上海倡辦「經正女塾」一事啟發，關注起女子教育。1898 年，邱菽園發表演講《華僑宜興女學》，讚賞梁啟超創辦女學之舉，並提出欲從中國延聘師資至新加坡，在該地興辦女學的想法（李元瑾，2001，頁 95）。邱菽園此番推動女學的言論，與林文慶的主張不謀而合，後者在呼籲華人捐款創設女校的時候，也引述了他的全文，表示「亟願引為同心」（李元瑾，2001，頁 95）。

1899 年 4 月 20 日，邱菽園、林文慶、宋旺相等人在新加坡的中國領事館開會商討籌辦女校的事務。除了這三位主要人物，辦校委員的陣容還包括：中國駐新加坡總領事劉玉麟、於華僑社會頗有名望的商人陳武烈、余柏城、陳合盛、王順智和林景貴（宋旺相，1993/1923，頁 253）。經商討，女校宗旨是：為海峽華人女性提供羅馬化的馬來文、華文、英文、算術、地理、音樂和縫紉等學科的教育（宋旺相，1993/1923，頁 253）。該女校取名「星坡中國女學堂」，英文為「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1899）。邱菽園以個人名義捐獻了三千元，

加上殖民地官員瑞天咸（Frank Swettenham）以及其他華人的資助，共籌獲六千元作為創辦基金（宋旺相，1993/1923，頁 85）。該辦校計畫在受到中國領事、殖民地官員、海峽華人領袖和華僑領袖的支持下，如期展開籌備。

捐款之餘，邱菽園效仿梁啟超使用報刊來為中國上海女學堂宣傳的方式，用他創辦的《天南新報》（1898 年–1905 年）發表興女學的言論。《天南新報》是由邱菽園於 1898 年在新加坡創辦的華文報刊，內容以傳播改良思想為主。自邱菽園等人在中國領事館遴選出辦校委員，《天南新報》便於 1899 年 4 月 22 日報導了此籌辦女校的會議內容和執委名單，呼籲海峽華人踴躍支持女校的創設（李元瑾，2001，頁 95）。在女校開課前半個月，該報連續刊登文章〈星坡中國女學堂準期開學告白〉，讓華僑跟進此女校的籌辦進度之餘，亦藉此招生。同時，該報也轉載了談論女學的文章，如〈論中國宜創設女義學〉、〈論女子宜讀史書〉和〈論女學〉（李元瑾，2001，頁 95），極力爭取華僑對女學的支持。

1899 年 7 月 3 日，這所「星坡中國女學堂」⁸（1899–至今）正式開學。縱然有報刊代為宣傳，該校的報名學生人數並不理想。開課之時僅得七位海峽華人女性註冊入學，兩個月以後，方增加至三十位女學生（宋旺相，1993/1923，頁 253）。在課程設置方面，該女校如預期般提供了羅馬化的馬來文、華文、英文、地理、算術、音樂和縫紉等學科的教育（宋旺相，1993/1923，頁 253）。該校的創立，實現了華人女子教育從私塾至新式教育的場景轉換，標誌華人女子教育步入另一發展階段。

1900 年至 1910 年間，中國時局對馬來亞華文女子教育發展的影響更為顯著。彼時清廷政局動盪，保皇派的康有為和革命派的孫中山曾數次在新馬短住或進行活動，活動範圍包括新加坡、檳城、吉隆坡、芙蓉和太平（鄭良樹，1998，頁 77）。兩派人士透過支持者在新馬辦報、組織宣傳機構，為華僑社會帶來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的觀念（顏清煌，1990，頁 3）。在此基礎上，興辦華文教育作為雙方所提倡的一項社會改革重點，獲得華

⁸ 1946 年，該校放寬招生制度，由只招收華族女學生改為招收各族女學生，但仍沿用創校時的校名以繼承先賢的辦校精神。時至今日，該校已成為新加坡其中一所歷史悠久的名校，而歷史上的新加坡華人女校，作為海峽華人為女性創辦的第一所學校，在馬來亞女子教育史上的示範意義值得被肯定。

僑社會的廣泛支持。隨著為華僑男性設立的新式華文學校數量越趨增多，女性的教育需求也得到關注。1908年9月13日，坤成女學校（1908–2008年改制為男女混合學校）於吉隆坡開課。這所女校是馬來亞最早成立的華文女校之一，其背後的主要資助人張鬱才和鐘卓京皆為康有為的支持者（鄭良樹，1998，頁120）。其後於1911年9月15日在新加坡開課的中華女校，則是由孫中山的追隨者鄭聘庭和潘兆庭等人所創辦（鄭良樹，1998，頁141）。往後，僑領中提倡女子教育者增多，多所女校在海峽殖民地、吉隆坡、雪蘭莪和霹靂等華僑人數較密集的地區創辦，使辦女校風潮在1930年代達到二次大戰前的興盛情況。

二、馬來社會改革與女子教育思想

二十世紀初，馬來社會面臨經濟、文化、民族意識上的衝擊，促使族群中湧現一股求變、革新的內部動力。這一時期，馬來平民階層多從事農業生產，但發生於馬來亞的地區性大米短缺問題危害了農民的經濟，也引起他們對土地缺失的擔憂（Harper, 1999, p. 28）。隨之而來的族群競爭為馬來人帶來更大的挑戰。相較於馬來族群，華族在英殖民地開墾地區的經濟貢獻⁹更受英殖民政府的重視（Harper, 1999, p. 29）以柔佛為例，在各種經濟生產工作中，華僑是受聘數量最多、薪資數目最高的族群（Winstedt, 1932, p. 21）。與此同時，華僑還晉升為掌控錫礦業和商業的族群，勢力範圍不但覆蓋馬來鄉村地區，有者更從馬來人手中將其經營不善的田地收為己用（〈本坡要聞二·馬來半島華僑概況〉，1930）。經濟的挫敗和外來人口攀升的情況引發了馬來民族的憂患意識，這個情況隨著英文教育和西方文化在馬來亞的傳播更趨惡化。由於英文教育多具有與伊斯蘭文化相悖的基督教文化，馬來族群擔心西方文化會對民族主體意識帶來負面的影響（Musa, 2010b, p. 3）。在種種民族危機下，馬來族群中的少壯派躍然成為振興民族的希望。

⁹ 倫敦《泰晤士報》於1928年刊載一篇文章，指出馬來亞的華人：「不僅人多，且居最重要及有用之地位，馬來人懶惰不任事，印度幾全為各農場工人，獨華人經營各種商業職務，勤儉耐勞……英屬馬來而無華人，今日作何景象，真不易想象也」（〈英屬馬來華僑的優越地位〉，1928，1版），這段文字對華人讚譽有加，對馬來人做出貶損。林文慶認為該文章是刻意挑起馬來人對華人的仇恨（Lim, 1930, pp. 1-11）。

少壯派是由一批從土耳其和埃及學成歸來的馬來青年穆斯林男性組成。有別於守舊的元老派穆斯林，少壯派致力於馬來亞推動以伊斯蘭教義為依據的社會改革運動（Musa, 2010b, p. 3）。在遊學土耳其和埃及期間，少壯派受到盛行於土耳其的婦女運動影響，促使他們將女性進步與社會的興盛聯繫起來（Musa, 2010b, p. 3）。以少壯派代表人物阿爾哈迪（Syed Shaykh Al-Hadi）為例，他主張：女性是族群和國家發展的奠基石，唯有女性提升，社會才會進步（Manderson, 1980, p. 31）。這種將女子教育和社會發展做出掛鉤的論述，與華族推動女子教育時的論述如出一轍。由此可見，此論述是知識分子在保守社會中推動女子教育時，用於合理化女子教育的宣言。然而，這種由馬來知識男性提倡的女性進步論述，是臣服於伊斯蘭教的父權主義之下的，據阿爾哈迪所述，女性不應在家庭外與男性進行競爭，且不能參與經濟問題的討論（Manderson, 1980, p. 31）。馬來社會中「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應與伊斯蘭教義有著聯繫¹⁰，據穆斯林的重要經典《古蘭經》第二章第二百二十八條所述，男性的權利比女性高一級，而女性應根據伊斯蘭教義忠於丈夫（Manderson, 1980, p. 25）。這種嚴格將男性和女性的職責做出劃分的方式，使女子教育目的僅止於培養賢妻良母。

馬來知識分子推動女子教育的方式跟華族知識分子有異曲同工之處，他們是以報刊、雜誌為媒介，推動女子教育思想。阿爾哈迪便是透過出版刊物來傳播新思想，如：《領導者》月報（1906–1910）、《平衡》報刊（1911–1915）、《東方之選》報刊（1927–1928）、《兄弟》月刊（1926–1931）和《親屬》日報（1926–1941）等。其中，刊物《領導者》除了針對馬來社會的倒退、馬來族群思想的陳腐做出揭露和批判，還格外關注馬來女性問題。該刊物除登載提倡女子教育的文章，亦對女性財產繼承權、一夫多妻制、女性社會地位等方面做出探討。《兄弟》月刊於 1927 年 1 月至 3 月份，在「女子園地」一欄連載埃及婦女解放運動倡導者卡西姆·艾敏（Qasim Amin）的文章《婦女的解放》傳播女子解放思想。《親屬》

¹⁰ 當代伊斯蘭女權主義者傾向於接受伊斯蘭教是對婦女民主和公正的信仰體系。她們透過改革伊斯蘭教法中偏重男性的內容，並通過強調《古蘭經》中性別公正的本質來對抗父權制權威。（Mohamad et al., 2006, p.88）

日報則分別於 1928 年和 1934 年開闢女性版面「女子園地」和「妻子園地」（Musa, 2010b, p. 5），為女性議題提供討論的平台。

在報刊雜誌之外，少壯派也透過小說創作傳播女子解放思想。阿爾哈迪先後於 1925 年和 1926 年在檳城出版《華麗達哈南的故事》和《努如安公主的故事》。他在《華麗達哈南的故事》中描繪了一位受過教育、勇敢且善於辯論的馬來女性（Hamisan, 2020, p. 166），該女主人公打破了過往穆斯林女性沉默而害羞的刻板印象。另外，同時期有一位馬來男作家阿末·穆哈莫·拉昔他路（Ahmad Muhammad Rashid Talu），透過小說提出馬來女性解放的想法。阿末·穆哈莫·拉昔他路被譽為現代馬來文學之父，他除了在《十二次苦難》（1929）中描寫勇敢追求愛情的女性，也在《那是沙爾瑪嗎？》（1928）一書中塑造了渴望自由的馬來女性女人公（Baharudin, 1999, pp. 63-64）。該主人翁既不戴頭巾，還穿短裙，與當時戴頭巾、著長衫和長裙的馬來女性形象迥然不同，是馬來女性解放的象征。

縱然一些馬來知識分子已經意識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然而馬來統治階層並未與知識分子在女子教育的發展上達成共識。自從統治權由馬來王族轉移到英殖民政府手上，馬來族群便依賴英政府出資辦校。根據 1928 年的馬來亞教育政策，英殖民政府須負責為馬來族群提供閱讀、書寫、算術、地理、歷史、手工及園藝等課程，同時英政府必須負責出資管理這些學校（Idris & Mohd Noor, 2015, p. 29）。由於男性歷來被視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群體，因此相較於馬來女性，馬來男性的教育發展尤受重視。故此，英殖民政府未投入同等的精力於馬來女校的建設，馬來女校數量便不見顯著增長。與英殖民政府同屬統治階層的馬來王族，也未對平民階層的馬來女子教育予以關注。在吉打州，馬來平民階層多次上書於馬來王族，要求後者建立女校，然而訴求卻多次受忽略（Musa, 2010b, p. 7）。經過馬來平民階層的爭取，吉打王族雖在 1928 至 1932 年期間批准四所女校的創辦，但仍優先關注男子教育的發展（Musa, 2010b, p. 8）。直至 1931 年，吉打州和玻璃市州只有五所女校，男校數量卻達八十二所（Hay & Hall, 1932, p. 34），足見教育資源分配上的性別差距。

以上針對華僑和馬來族群興女學思想所作出的考察，可發現這股思想是在相近的時間段，即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發酵於族群內部。與此同時，馬來亞興女學思想的產生契機與華族和馬來族群中有著留學經驗、

接觸了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宋旺相，1993/1923，頁 198；Musa, 2010b, p. 3）有極大關聯。不論是華族還是馬來族群，都因關注到進步社會的教育普及情況而對自身族群的退步心生焦慮。值得一提的是，華族和馬來族群領袖皆將女子教育視為解決族群沒落問題的良策（Lim, 1897, pp. 52-58; Musa, 2010b, p. 3; Song, 1897, pp. 16-23），認為通過教育使女性成為賢妻良母，能影響社會走向進步。縱然華僑和馬來族群中的知識分子對女子教育保有熱忱，然而華社僑領憑藉號召力及經濟能力，足以動員民眾籌款建校。反觀馬來族群，因普遍對女子教育存有保守的看法，難以掀起主動辦學的風潮。

參、知識女性代表人物推動女子教育的特點

除了男性，華僑和馬來族群中的知識女性亦投入教育發展的工作，可作為代表人物的是劉韻仙（1901-1975）（見圖 1）及再儂·蘇萊曼（1903-1989）（見圖 2）。劉韻仙生於中國江西省一個富裕家庭，本名劉湘英，籍貫江西。作為家中獨女的劉韻仙，於七歲入光道小學，接著升長沙福湘女子中學，後進入北平燕京大學深造（柯木林，1995，頁 28；《教育家》，2020）。她曾任湖南湘潭三育學校教員，爾後從事新聞工作遊歷各地，擔任過古巴《民聲日報》編輯、《緬甸晨報》副總編輯（《教育家》，2020）。她於 1927 年漫遊歐洲時途經新加坡，獲聘新加坡公立南洋女子學校校長，從此走上教育事業一途（柯木林，1995，頁 28）。

在馬來女子教育方面，再儂·蘇萊曼是極少數有機會於二十世紀初接受教育的馬來女性。再儂·蘇萊曼於 1903 年生於海峽殖民地的馬六甲，她於 1909 年在馬六甲一所由西方傳教士建立的英文女校接受英文教育（Tan Sri Hajah Zainun bt Munshi Sulaiman, 2021）。完成中學學業後，她於 1916 至 1921 年期間在馬來亞雪蘭莪州自資開辦學校為男童女童授課，其後到柔佛麻坡多所女校任教（Tan Sri Hajah Zainun bt Munshi Sulaiman, 2021）。1927 年，再儂受委任為柔佛女子學校最高監督，這是當時女性所能達到的最高身份地位。

劉韻仙于 1927 年成為南洋女校校長後，便將致力於發展校務（南洋

女中校刊編輯委員會，1935，頁 1），使南洋女校逐漸樹立起威望，成為當時華僑女界美談；而再儂由教職作為起點，後於 1927 年榮獲馬來亞最高的女子教育行政領導職銜（Tan Sri Hajah Zainun bt Munshi Sulaiman, 2021）。兩位女教育者憑藉各自的辦學工作，將華僑和馬來族群的女子教育發展推至高點。本節將探討兩位知識女性流露的教育觀及推動教育的方式，以此展現馬來亞女子教育的面貌。

圖 1

劉韻仙



資料來源：南洋女中校刊編輯委員會（1935）。星加坡南洋女子中學校刊，星洲日報有限公司，無頁碼。

圖 2

再農·蘇萊曼



資料來源：Pictorial (2021, January). *Official website National Library of Malaysia*.
https://www.pnm.gov.my/yangpertama/Edu_Guru_PHOTO1.htm

一、華僑女知識分子與女子體育

創辦於 1917 年的新加坡公立南洋女子學校並不是英殖民地最早成立的女校，然而它是一所早在 1918 年便開辦女子師範班培育師資，且體育成績尤為傑出的女校。南洋女校是由中國革命同盟會南洋分會的一批領袖張永福、陳楚楠、莊希泉、林瑞軒、黃肖岩等人於 1917 年發起，獲莊丕唐、甘清泗、洪神扶等人讚助支持。該校在創立之初，便聘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畢業的余佩皋擔任校長，租用三角埔 (Dhouby Ghaut) 的建築物為校舍。該校於 1917 年 8 月 15 日開學，學生約百名。該校於 1918 年開設兩年制師範班，並於 1921 年將師範科改為三年制 (南洋女中校刊編輯委員會，1935，頁 1)。

值得注意的是，自 1927 年 6 月劉韻仙受聘為南洋女子學校校長，便持續擔任校長達四十年，將南洋女子學校發展成當時華僑社會中的傑出女校。在劉韻仙掌校之前，南洋女子學校和許多華校一樣面對人事變動頻繁的問題。自余佩皋於 1921 年辭職後，伍絳霄、彭夢民、禡偉靈、方文均、

王淑英、汪蔚丹等人曾相繼任校長（南洋女中校刊編輯委員會，1935，頁1），但任期皆短暫。因此，相信劉韻仙是引領該女校穩健發展的重要推手。1930年底，該校董事部購買肯士路（Kings Road）地段發展校園，並將校名改為「南洋女子中學校」，小學部則稱「南洋女子中學校附屬小學」（南洋女中校刊編輯委員會，1935，頁1）。1931年，學校搬遷到新校園，積極擴建校舍與設備（南洋女中校刊編輯委員會，1935，頁1）。有了充足的空間，即開辦附屬幼稚園。至此，劉韻仙得以實現她由幼稚園、小學、初中到高中的一貫教育理想。

南洋女校給子女學生的價值灌輸是積極開放的，正如南洋女校校歌所說：「我們跟時代進行，高唱諧和的歌音。五育平均齊發展，堂堂地做個完人。共同努力追趕光明，改造畸形社會鍛煉身心。我南洋桃李成蔭，我南洋校譽光榮。在太平洋的西岸，在印度洋的東濱。共同努力振起精神，鞏固文明基礎鍛煉身心。」（南洋女中校刊編輯委員會，1935，無頁碼）。校歌以振奮的語調表彰南洋女學校的辦學精神，以激發女子志氣為主，合群與鍛煉亦成為貫穿其間的要素。此歌在短小的篇幅中，收納了當時流傳的新思想，鼓舞女性「振起精神」、「鍛煉身心」，肩負起「改造畸形社會」的重任。

身為校長的劉韻仙具有男女平等的觀念，她認為女性本該具有與男性平等的教育機會（劉韻仙，1930，頁F19）。而女性在此基礎上還有一層「國民之母」的身份，因此女子教育與民族的生存、國家的強盛（劉韻仙，1930，頁F19）有直接的關係。在南洋女校裡，這種以國家民族為中心的教育觀是透過體育教育來貫徹。事實上，晚清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已經將身體與「強國保種」觀念作出聯繫（游鑑明，2009，頁30）。以梁啟超為例，他透過〈變法通議：論女學〉指出西方女子藉著體操達到強種目的（梁啟超，1999，頁709-714）。隨著清廷於1902年和1904年透過《欽定學堂章程》和《奏定學堂章程》將兵式體操納入學堂中的體育課，國民體育觀得到確立（游鑑明，2009，頁31）。到了1922年，中國教育體制變革，體育課內容不再以體操和兵操為主，而是加入田徑、球類等項目，然而「體育救國」的體育理念仍被沿用（游鑑明，2009，頁39-41）。南洋女校對中國時局及教育制度的把握極為靈敏，在體育風氣還未盛行於南洋時便率先實施體育教育，可惜遭致學生家長的不滿，引發學生退學（南洋女中校

刊編輯委員會，1935，頁 69）。雖然南洋女校在早期實行的體育教學不受家長接納，但其在體育教育上的開創和推廣之功值得肯定。

自劉韻仙掌校，便在校內積極推廣體育，設立豐富的課外運動項目：游泳、籃球、排球、羽球、乒乓和田徑（南洋女中校刊編輯委員會，1935，頁 70）。該校實行系統化的體育訓練制度，每學期按照學生的年齡和表現進行分組，由教師、表現傑出的學生擔任指導員（南洋女中校刊編輯委員會，1935，頁 71）。在體育培養之餘，南洋女校對學生的學業成績亦有嚴格的要求。該校除規定運動員選手不得缺課，還需她們在每學期大考中保持學業水平，凡有一門科目不及格即喪失選手資格（南洋女中校刊編輯委員會，1935，頁 74）。

1930 年代的馬來亞，只有屈指可數的女校施行體育教育，致使南洋女校躍升為一所憑藉傑出運動表現而聲名遠播的女校。放眼當時的馬來亞華僑社會，南洋女校佔有運動界的重要位置：助星洲區在第一屆馬來亞華僑運動大會（1931 年）及第二屆馬來亞華僑運動大會（1933 年）奪得女子總錦標，同時是第三屆馬華運會（1935 年）星洲區女選手的主要成員（南洋女中校刊編輯委員會，1935，頁 73）。在新加坡當地，南洋女校亦有優異表現，除了於 1934 和 1935 年的星洲華僑學校聯合運動會中籃排球和田徑項目獲冠軍，亦在 1934 年之新加坡國際公開羽球單打冠軍及雙打冠亞軍（南洋女中校刊編輯委員會，1935，頁 73）。

彼時，新馬華人社會跟中國有著密切往來，由中國舉辦的「全國運動會」亦作為促進雙方交流的重要項目，受到新馬華僑社會的重視。當中國舉辦全國運動會邀請僑胞參賽時，南洋女校作為體育成績傑出的女校，多次作為星洲隊的主要成員與中國體育隊進行交流。如在 1931 年，馬華女選手廿一人回中國參加「民廿流產之全運會」，隊伍中的南洋女校選手佔了八位（南洋女中校刊編輯委員會，1935，頁 73）。此外，當廣州華南體育研究會之女子排籃球隊、廈門女子籃球隊、上海東亞女子體育專門學校籃球田徑賽隊及上海兩江女子體育師範籃球隊到新加坡時，南洋女校亦作為代表與這些體育隊進行切磋和交流（南洋女中校刊編輯委員會，1935，頁 74）。

體育項目除為南洋女校打開知名度，亦為女校發展受到僑胞的支持。在 1934 年暑假，劉韻仙校長為實現南洋女校建設圖書館的計畫，率領該

校籃排羽球隊到暹京、荷屬棉蘭、檳城等地與當地球隊比賽切磋及為校籌款。據知，該一舉跨過暹荷兩屬地的「遠征」之行是當時馬來亞體育界中的空前舉動。而南洋女校亦因嚴謹紀律和團體精神為暹京華僑社會留下良好印象，獲暹京《民國日報》讚譽：「舉措大方，態度誠懇」（南洋女中校刊編輯委員會，1935，頁 79）在這趟交流中，南洋女校共迎來卅一戰，勝廿七戰。（南洋女中校刊編輯委員會，1935，頁 79）南洋女校不但憑藉出色的運動表現贏得校譽，還為校籌得叻幣四千餘元（南洋女中校刊編輯委員會，1935，頁 79）作為建築圖書館基金。同年七月，南洋女校還在星洲排籃球總會贊助下舉行三晚排籃球慈善賽，籌得二千餘元（南洋女中校刊編輯委員會，1935，頁 79）。最終，南洋女校圖書館得以於 1936 年建成，而體育則在此學校擴張過程上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馬來知識女性與賢妻良母觀

回顧再儂的教育志業，其重要事跡是成立了首個馬來女教師組織，掀起馬來女子教育風潮。她於 1930 年 4 月創立柔佛馬來女教師聯盟團體。透過創辦該團體，再儂希望將馬來女教師團結起來，商議婦女課題的同時，以族群進步為共同目標（Hussin, 2011, p. 137）。

如上文所述，在二十世紀初期，馬來領袖多以報刊和雜誌來宣傳新思想。馬來報刊雜誌既由男性創辦，無法掌握話語權的馬來女性在提倡教育方面所發出的呼聲是微弱無力的。隨著馬來男性開始認可女子教育的重要性，雪蘭莪、森美蘭和馬六甲的教師聯盟團體於 1924 年創刊的《教師雜誌》（Majallah Guru）（1924-1941）中開闢「女性專屬」一欄，知識女性方獲得首個專屬的發聲位置。1925 年 3 月，有女學生拉曼·亞都拉興（Rahman Abdul Rahim）在該雜誌撰文指出：女性作為家庭中的「第一位老師」，在教育孩童方面佔重要角色，因此女性應受教育以便更好地完成教育子女、操持家務的職責。（Musa, 2010a, p. 260）馬來社會中濃厚的父權色彩，致使女子教育發展舉步維艱。為此，她在文中申述「別以為我們想要成為地方法官或者官員。我們只要求能夠獲得操持家庭的知識及宗教教育」（Musa, 2010a, p. 260），希望藉此減輕男性對女子教育的戒備。

再儂多次以筆名再娜·阿爾納德拉（Zainah Al-Nadrah）參與了《教師雜誌》的撰文行列。她於 1926 年 3 月，在該刊撰文批評馬來父母在女

兒年滿九歲便命其輟學，急於為女童尋找婚配對象的現象（Musa, 2010b, p. 6）。此外，馬來族群封建的習俗是她筆下的批判內容。1927 年 11 月，她撰文批判馬來父母的封建管教，認為心智成熟、接受足夠宗教教導的女孩，應具備自己尋找人生伴侶的權利（Musa, 2010a, p. 261）。1929 年 12 月，她亦批判馬來族群不讓女子外出及逼婚的封建習俗（Musa, 2010a, p. 261）。

以報刊或雜誌作為推廣新思想的方式既為大勢所趨，再儂在創立了柔佛馬來女教師聯盟團體後，順勢創辦了機關雜誌《馬來月報》（*Bulan Melayu*）。1930 年 6 月 1 日，該刊作為馬來亞第一份馬來女性雜誌，以爪哇文在柔佛出版，再儂擔任主編。兩位馬來女老師花蒂瑪·雅歌（Fatimah Yaakub）和莎利法·安頌·阿里（Sharifah Anson Ali）擔任再儂的助手。其發刊目的與團體方向一致：提升馬來母親及子女的知識、鼓勵馬來母親與女兒追求進步、舉辦辯論會啟迪馬來女性的智慧、鼓勵馬來女性從事商業活動（Musa, 2010b, p. 6）。從此，知識女性不再受限於報刊雜誌中的單一欄目，得以在更廣闊的版面進行書寫。

在成立的早期，該雜誌從撰稿、發行至管理方面，都得到了馬來男性的幫助（Musa, 2010b, p. 6）。據知，當時活躍於柔佛出版業的出版商（Al-Attas Press）是該雜誌的重要貢獻者之一（Musa, 2010b, p. 6）。在供稿方面，著名的馬來文學家扎巴（Za'aba）投稿了寫詩的技巧、從英文譯到馬來文的文章；阿爾哈迪則撰寫了母親育兒守則，教導女性育兒知識（Musa, 2010a, p. 256）。該雜誌雖以女校師生為期待讀者，但馬來男性讀者的支持為雜誌的刊行提供了持續性發展（Musa, 2010b, p. 6）。

當時招收馬來女學生的學校類型有英文女校、馬來女校兩種。由於英文女校大多建立於市區，就讀此類女校的馬來女學生多來自上層階級的皇族和貴族家庭（Idris & Mohd Noor, 2015, p. 22; Musa, 2010b, p. 3）。由於英文女校和馬來女校有著不同的教學語言和學制，因此就讀於馬來學校的學生必須符合特定的年齡和學業條件¹¹，才能轉學進入英文學校，這些

¹¹ 馬來學生的轉學條件：不得超過 11 歲且已經完成馬來學校的小學三年級學業、學業成績良好且通過英文校的入學面試、必須先在馬來人特別班完成兩年的學業以掌握英語會話和書寫能力，才能進入英校的小學四年級班級（Idris & Mohd Noor, 2015, p. 23）。

限制導致馬來女學生難以進入英校求學。與此同時，大部分傳統而保守的馬來家庭並不贊成把女兒送到英文女校求學。他們反對英文教育的原因無非是擔心：教會學校成為基督教傳播地、學校教育妨礙宗教教育、男女見面交往的機會增加，以及家務事無人打理（Manderson, 1978, pp. 106-107; Manderson, 1980, p. 30）。對於平民階層的馬來家長而言，讓女子接受學校教育不比讓子女學習務農和家務等勞力工作來得重要（Manderson, 1980, p. 30）。只有少數村長、地主家庭（Musa, 2010b, p. 3）的馬來女童有機會進入馬來女校求學。結束三、四年級的馬來小學教育後，少數女童有機會成為教師助手，輔助教學工作（Idris & Mohd Noor, 2015, p. 20）。

實際上，1930年代的馬來女性教育情況比起馬來男性仍落後許多。以1931年的柔佛州為例，馬來男校有100所，求學人數達8830人；反觀馬來女校數目只有13所，求學人數為877人（Winstedt, 1932, p. 24）。這群知識女性透過《馬來月報》將馬來男女懸殊的求學人數刊出，希望使馬來女性族群引以為戒。1930年6月，《馬來月報》刊出了1928年馬來聯邦和海峽殖民地求學的馬來男童、女童數量，告誡馬來女性關注該教育機會不平等的現象（Hussiin, 2011, p. 139）。根據表1，1928年的求學男性人數有46,244人，表2則顯示女性求學人數是9,560人（Hussiin, 2011, p. 139），可謂人數懸殊。

表1

在馬來聯邦和海峽殖民地求學的馬來男學生數量（1928年）

學校	學校數量	男學生求學人數
馬來聯邦	413	28,892
海峽殖民地	176	17,852（包括英屬北婆羅洲納閩2所學校學生）
總數	589	46,244

資料來源：Hussiin, H. (2011). Malay education issues in Malay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1920s to 1940s. *SEJARAH: Journal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19(19), p. 139.

表 2

在馬來聯邦和海峽殖民地求學的馬來女學生數量（1928 年）

學校	女學生數量	男校的女學生數量	女學生總數
馬來聯邦	3,863	2,948	6,811
海峽殖民地	2,203	546	2,749
總數	6,066	3,494	9,560

資料來源：Hussiin, H. (2011). Malay education issues in Malay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1920s to 1940s. *SEJARAH: Journal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19(19), p. 139.

除了意識到族群中存在男女教育機會不均的問題，馬來女性也透過關注其他族群的教育發展，反思自身族群的女性教育問題。在 1930 年代，新馬華僑的辦女校成果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眼見華族女子教育的興盛，《馬來月報》於 1930 年 6 月刊出華校數據（參照表 3），指出華族在未獲殖民政府的支持下仍有卓越的辦校成效，呼籲馬來社會應以華族的辦學精神為學習目標（Hussiin, 2011, p. 140）。

表 3

在馬來聯邦和海峽殖民地求學的華族男女學生數量（1928 年）

學校	學校數量	學生數量	男學生數量	女學生數量	教師數量
馬來聯邦	335	22591	17888	4703	963
海峽殖民地	361	21370	16156	5214	839
總數	696	43961	34044	9917	1802

資料來源：Hussiin, H. (2011). Malay education issues in Malay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1920s to 1940s. *SEJARAH: Journal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19(19), p.140.

除了上述的積極論調，馬來族群也在論述間著重強調民族身份，透過比較「馬來族群」和「非馬來族群」的教育情況，凸顯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1930 年 6 月，《馬來月報》刊出文章，闡明「馬來亞是我們這些先來者的祖國，這裡有我們的王族和祖先，這裡有我們的田地和

家園，憑什麼要讓異族得到原屬於我們馬來族群的權利」（Hussiin, 2011, p. 146）。此論述從捍衛族群利益的角度出發，顯露出馬來族群對異族崛起現象的警覺。1931年1月，《馬來月報》指出已有華僑女性和印度女性進入醫學院求學，並以醫科作為事業，大部分馬來女性卻仍不識字（Hussiin, 2011, p. 140）。1935年6月份的《馬來月報》則有文章闡述沙蓋族上學的情況，批評馬來族群還在原地踏步（Hussiin, 2011, p. 138）。可見，教育領域成為了馬來族群與其他族群間競爭、較量的領域。改革社會之餘，馬來民族推動教育的深層目的是捍衛族群地位。

如上所述，馬來族群認為推動女子教育可捍衛族群權益，但女子教育的內容僅止於培養合格的母親和妻子。根據再儂於1930年8月刊登於《馬來月報》的文章所述，她理想中的女性特質是：有組織家務能力、了解母親的責任、有能力給孩子提供宗教引導、對上蒼保持忠誠（Musa, 2010a, p. 258）。同時，再儂極為注重女性的家庭職責，她認為女性必須擁有勤勞的美德，在完成耕種、編織、裁縫、烹飪等工作之餘，應輔助和支持家中男性投入心力為民族和國家服務（Musa, 2010a, pp. 263-264）。該觀念與她的教育著重點一致，促使她在推動女子教育發展時注重培養馬來女性的賢妻良母特質。據1931年的聯邦教育報告，馬來女校的課程增加了烹飪、陶藝、剪紙、縫紉、衛生護理等家政課，而這些課程受到了馬來族群的歡迎（M. Teoh, 2018, p. 49）。直至1930年代，馬來族群的女子教育觀點始終著重於培養家庭中的賢妻良母。

肆、結論

在二十世紀初期的馬來亞，華僑和馬來社會處於教育現代化的轉型時期。華僑知識分子和海峽華人受到中國晚清康有為、梁啟超宣傳的女學思想啟蒙；馬來人則受土耳其婦女運動和英殖民政府辦女校的事跡影響，從而認識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此時，以報刊、雜誌宣傳新思想蔚為風氣，華僑和馬來領袖皆投入辦報、辦雜誌的行列，以文字作為傳播女子教育思想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華僑和馬來族群在推動女子教育時，皆從族群的角度出發，認為教育關係自身族群的存亡。回本溯源，華文女子教育是

在「強國保種」、「體育救國」的歷史語境下發展而成；馬來女子教育則是知識分子在「社會改革」和「捍衛族群」的背景下加以推動。換言之，華文女子教育和馬來女子教育思想背後皆隱含著族群自身的憂患意識，而兩個族群都把女子教育視作能使族群進步、改革社會的良策來加以推廣。

在知識女性方面，劉韻仙（1901–1975）和再農·蘇萊曼（1903–1989）皆因有幸在成長過程中接受正規女子教育，並因著契機而得以躍升為華僑和馬來族群中的女教先驅。劉韻仙生於中國，有機會接受中國小學、中學甚至大學程度的學業，尚有遊學及遊歷多國的經驗，這於當時的女性而言是一種罕見的特殊經歷。劉韻仙的學歷及遊歷經驗予人見識豐富的印象，使她脫穎而出獲聘為南洋女校的校長。在劉韻仙擔任南洋女校的校長期間，她將體育教育落實於教學中，使南洋女校憑藉傑出的體育表現晉升為 1930 年代新加坡的重要女校。再農則生於馬來亞，有著英女校的求學背景及自資辦學的經歷。在當時多數馬來家長不看重女子教育的歷史背景下，再農在英女校求學的經歷更顯特殊。其後，再農·蘇萊曼創立馬來女教師團體、發行第一份馬來女性雜誌、受委任為柔佛女子學校最高監督之職的事蹟，皆奠定了其在馬來女子教育發展中的重要位置。在當時提倡女性受教的論述多為培養賢妻良母的情境下，兩位知識女性擔任女校管理層、女界領導人物的事跡更顯重要，因其展現了女性在家庭以外的發展面貌及可能，為女界的教育發展起到鼓舞作用。

參考文獻

- 女學說（1888年6月25日）。叻報，1版。
[Female Education (1888, June 25). *The Lat Pau*, p. A1.]
- 女子宜於讀書說（1890年12月26日）。叻報，1版。
[A woman should study (1890, December 26). *The Lat Pau*, p. A1.]
- 女子實貴讀書說（1890年7月1日）。叻報，1版。
[The importance of female education (1890, July 1). *The Lat Pau*, p. A1.]
- 叻地宜興女教說（1894年5月2日）。叻報，1版。
[The desirability of girls' schools in Singapore (1890, May 2). *The Lat Pau*, p. A1.]
- 本坡要聞二：馬來半島華僑概況（1930年2月17日）。新國民日報，8版。
[Malay peninsula overseas Chinese (1930, February 17). *The Sin Kuo Min Press Chinese New Paper*, p. A8.]
- 李元瑾（2001）。東西文化的撞擊與新華知識分子的三種回應：邱菽園、林文慶、宋旺相的比較研究。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八方文化創作室。
[Lee, G. K. (2001). *Responding to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Singapor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Khoo Seok Wan, Lim Boon Keng and Song Ong Si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Global Publishing.]
- 宋旺相（1993）。新加坡華人百年史。（葉書德譯）。中華總商會。（原著出版於1923年）
[Song, O. S. (1993). In Ye, S. D. (Trans.),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Chinese Translation).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 何曉夏、史靜寰（1996）。教會學校與中國教育近代化。廣東教育出版社。
[He, X. X., & Shi, J. H. (1996). *Missionary school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Guangdo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 林遠輝、張應龍（編）（1998）。中文古籍中的馬來西亞資料彙編。馬來西亞大會堂總會。
[Lin, Y. H., & Zhang, Y. L. (Eds.) (1998). *A collection of materials on Malaysia in ancient Chinese works*. The Federation of Chinese Associations Malaysia.]
- 范若蘭（2004）。戰前新馬華僑女子教育的發展。東南亞研究，2，72-77。
[Fan, R. L. (2004). The development of pre-war Malaysian Chinese girls' educatio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 72-77.]
- 英屬馬來華僑的優越地位（1928年8月1日）。新國民日報，1版。
[The Privileged status of the Chinese in British Malaya (1928, August 1). *The Sin Kuo Min Press Chinese New Paper*, p. A1.]

- 柯木林（編）（1995）。*新華歷史人物列傳*。教育出版私營有限公司。
[Kua, B. L. (Ed.) (1995). *Famous historical figures of Singaporean Chinese*. Education Publishing Private Limited.]
- 南洋女中校刊編輯委員會（1935）。*星加坡南洋女子中學校刊*。星洲日報有限公司。
[Nanyang Girls' School Editorial Board (1935). *School magazine of Nanyang girls' high school*. Sin Chew Jit Poh.]
- 振興女學議（1897 年 8 月 7 日）。*檳城新報*，1 版。
[Advocacy for women's studies (1897, August 7). *Penang Sin Poe*, p. A1.]
- 陳倫炯（1984）。*海國聞見錄校註*。（李長傳校註）。中州古籍出版社。
[Chen, L. J. (1984). In Li, C. F. (Ed.), *The records heard and seen from the coastal countries*. Zhongzhou Ancient Books Press.]
- 陳鴻瑜（2010）。明朝與馬六甲王朝之關係：戰略前沿的建立和喪失。*漢學研究*，**28**（4），139-169。
[Chern, H. Y. (2010). Ming China and Malacca: Establishment and loss of a strategic front. *Chinese Studies*. 28(4), 139-169.]
- 張亞群（2012）。*自強不息，止於至善—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山東教育出版社。
[Zhang, Y. Q. (2012). *Lim Boon Keng the president of Xiamen University*. Shando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 教育家（2020，12 月）。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海外華人研究。http://www.lib.nus.edu.sg/chz/chineseoverseas/oc_education.html#lyx
[Educators (2020, Decembe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http://www.lib.nus.edu.sg/chz/chineseoverseas/oc_education.html#lyx]
- 許雲樵（譯注）（1966）。*馬來紀年增訂版*。新加坡青年書局。
[Hsu, Y. T. (Ed.) (1966). *Malay annals (revised edition)*. Youth Book Co.]
- 梁啟超（1999）。*新民說·論尚武*。梁啟超全集第 2 卷。北京出版社。
[Liang, Q. C. (1991). *New national education: Martial spirit. Complete works of Liang Qichao (Vol. 2)*.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 黃克武（2014）。何謂天演？嚴復「天演之學」的內涵與意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5**，129-187。
[Huang, K. W. (2014). What is Tianyan? The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of Yan Fu's theory of natural evolutio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85, 129-187.]
- 黃賢強（2008）。*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廈門大學出版社。
[Wong, S. K. (2008). *A new historiography vision for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a and nanyang Chinese*.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 游鑑明 (2009)。眾聲喧嘩的女子體育觀。運動場內外：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 (1895-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Yu, C. M. (2009). *On and off the playing fields: A modern history of physical education for girls in Eastern China (1895-1937)*.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 葉鐘玲 (2010)。新加坡華文女校的起源與發展 (1911-1942)。南洋學報, 64, 45-65。
- [Yeap, C. L. (2010).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girls' schools in Singapore (1911-1942).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64, 45-65.]
- 楊貴誼 (1997)。新客華人克服語文難題之妙方。資料與研究, 27, 39-44。
- [Yang, Q. Y. (1997). How Chinese immigrants in Singapore overcome language difficulties. *Rosa Sinensis*, 27, 39-44.]
- 鄭良樹 (1998)。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 (第一分冊)。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
- [Tay, L. S. (1998).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 (Volume 1)*. The United Chinese School Teacher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 論女學 (1899年8月18日)。檳城新報, 1版。
- [Discussion on women's studies (1899, August 18). *Penang Sin Poe*, p. A1.]
- 論女學堂 (1898年1月3日)。檳城新報, 1版。
- [Discussion on girls' school (1898, January 3). *Penang Sin Poe*, p. A1.]
- 劉韻仙 (1930)。南洋女子教育不發達的原因。載於星洲日報週年紀念刊 (F19-F23)。星洲日報有限公司。
- [Liew, Y. S. (1930). Reasons for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girls' education in Nanyang. In *Sin Chew Jit Poh's annual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first anniversary (F19-F23)*. Sin Chew Jit Poh.]
- 顏清滄 (2005)。馬來西亞華人的歷史變革 (1403-1941)。海外華人的社會變革與商業成長。廈門大學出版社。
- [Yan, C. H. (2005).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1403-1941)*. Overseas Chinese social change and business growth.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 Andaya, B. W., & Andaya, L. Y. (2001). *History of Malaysia* (2nd ed.). Palgrave.
- Baharudin, R. (1999). Novel-novel ahmad rashid talu : Antara perubahan dan tradis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Malay World and Civilization*, 17(4), 57-67.
- [Baharudin, R. (1999). Change and tradition in Ahmad Rashid Talu's nove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Malay World and Civilization*, 17(4), 57-67.]
- Elcum, J. B. (1908). Education. In A. Wright (Ed.),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pp. 267-280). Lloyd's Greater Britain.
- Forst, Mark. R. (2005). Emporium in imperio: Nanyang networks and the straits Chinese in Singapore, 1819-1914.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6(1), 29-66.

- Harper, T. (1999).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Malay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misan, N. S. (2020). Syed Syeikh Ahmad Al-hadi's thought on women's emancip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Re-evaluation and analysis. *Afkar: Journal Akidah & Pemikiran Islam*, 2, 157-184. <https://doi.org/10.22452/afkar.sp2020no2.6>
- Hay, M., & Hall, J. (1932). *Colonial reports annual states of Kedah and Perlis for the year 1931*. Kedah Government Press.
- Hussiin, H. (2011). Isu pendidikan melayu dalam akhbar dan majalah melayu, 1920-an hingga 1940-an. *SEJARAH: Journal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19(19), 135-151.
- [Hussiin, H. (2011). Malay education issues in Malay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1920s to 1940s. *SEJARAH: Journal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19(19), 135-151.]
- Idris, M., & Noor, Arba'iyah M. (2015). Pentadbiran dan pengurusan pendidikan perempuan melayu di negeri-negeri melayu bersekutu, 1896-1941. *SEJARAH: Journal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24(1), 17-30.
- [Idris, M., & Noor, Arba'iyah M. (2015). The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Malay women's education in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896-1941. *SEJARAH: Journal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24(1), 17-30.]
- Lim, B. K. (1897). Our enemies. *The Straits Magazine*, 1(1), 52-58.
- Lim, B. K. (1930). The so-called clash of races in Malaya. In Song, O. S. (Ed.), *The Straits Chinese annual*. The Straits Times Press.
- Manderson, L. (1978). The development and direction of female education in peninsular Malaysia.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51(2).
- Manderson, L. (1980). *Wanita, Politik dan Perubahan : Pergerakan Kaum Ibu UMNO, Malaysia, 1945-1972*. Penerbit Fajar Bakti.
- [Manderson, L. (1980). *Women, politics and change: The UMNO mothers' movement, Malaysia, 1945-1972*. Fajar Bakti Publishing.]
- Magazine, T. S. (1897, March 31). *The Straits Times*. A3.
- Mohamad, M., Ng, C., & Beng Hui, T. (2006). *Feminism and the women's movement in Malaysia- An unsung (r)evolution* (1st ed.). Routledge.
- M. Teoh, K. (2018). *Schooling diaspora : Women, education,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British Malaya and Singapore, 1850s-1960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usa, M. (2010a). The woman question in Malayan periodicals 1920-1945. *Indonesia and the Malay World*, 38(111), 247-271.
- Musa, M. (2010b). Wanita melayu, kesedaran pendidikan dan pembentukan masyarakat malaysia moden. *Malaysia dari Segi Sejarah*, 38, 1-24.
- [Musa, M. (2010b). Malay women, educational awareness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Malaysian society. *Perspective on Malaysian History*, 38, 1-24.]
- National Library Board Digital Library (2019, December). *St. Margaret's sqqaaaaachool, Singapore's oldest school*. History SG An Online Resource Guide. <https://eresources.nlb.gov.sg/history/events/a204ba18-914e-44e5-9b30-efa3b0cfbdf4#:~:text=St%20Margaret's%20School%2C%20Singapore's%20oldest,is%20at%2011%20Farrer%20Road>

- Paparan Bergambar (2021, January). *Portal Rasmi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https://www.pnm.gov.my/yangpertama/Edu_Guru_PHOTO1.htm
- [Pictorial (2021, January). *Official website National Library of Malaysia*. https://www.pnm.gov.my/yangpertama/Edu_Guru_PHOTO1.htm]
- Raffles Girls' School (2006). *Historic miletones. In Daughters of a better age, 1844-2006* (2nd ed., pp. 19-56). Raffles Girls' School (Secondary).
-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1899, April 24).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884-1942.
- Singapore Institution (1844, August 8).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2.
- Song, O. (1897).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woman. *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1(1), 16-23.
- Swettenham, F. (1899). *The real Malay*. John Lane.
- Swettenham, F. (1907). *British Malaya: An account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British Influence in Malaya*. 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 Tan Sri Hajah Zainun bt Munshi Sulaiman (2021, January). *Official portal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http://www.arkib.gov.my/en/web/guest/tan-sri-hajah-zainun-bt-munshi-sulaiman>
- Winstedt, R. (1932). *Annual report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rogress of the people of Johore for 1931*.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Johore.